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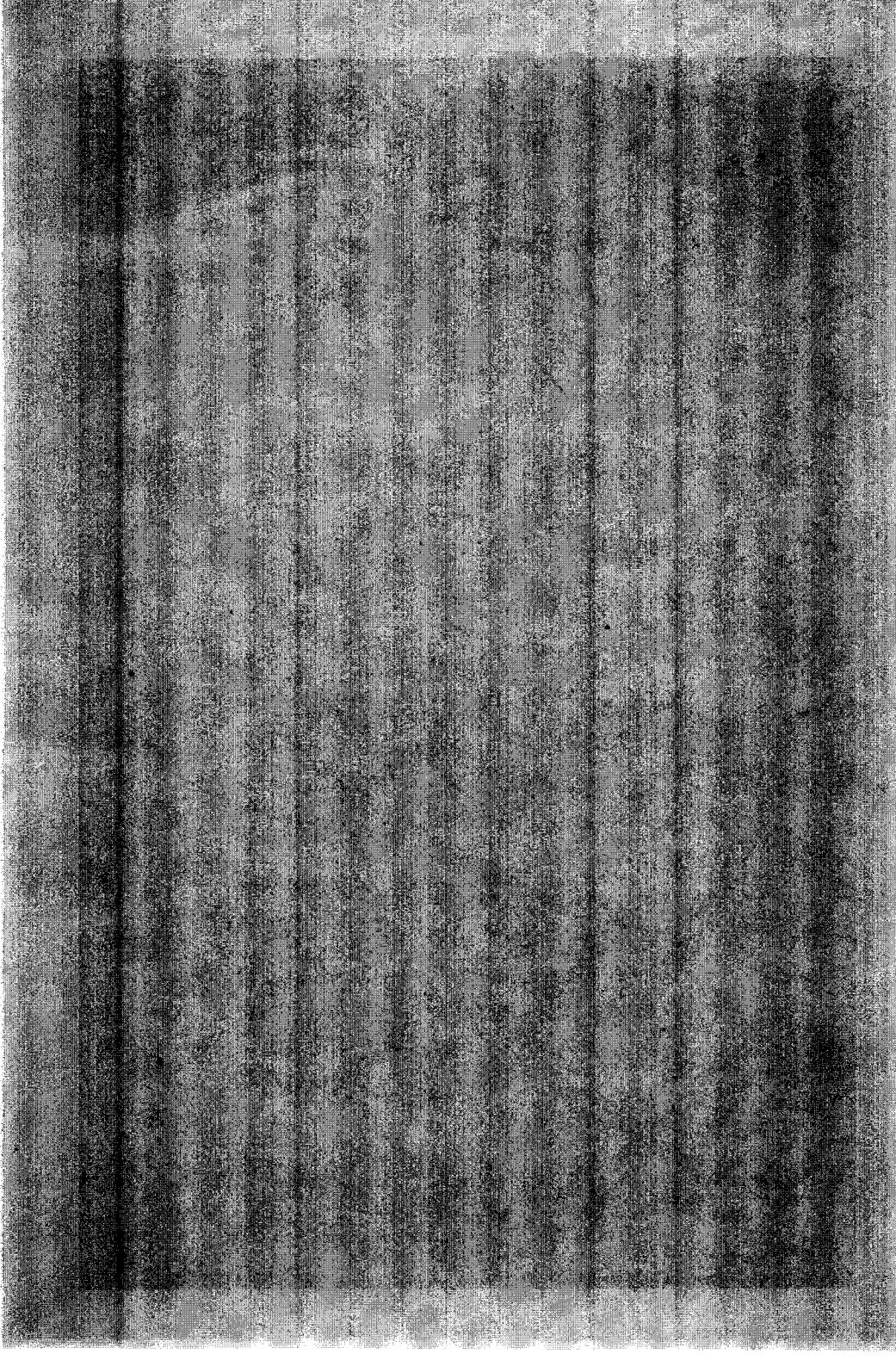
第一部 受伤的文明

“我所看到的，是中国人对历史的漠视，对传统的漠视，对文化的漠视，对生命的漠视，对人性的漠视，对道德的漠视，对法律的漠视，对科学的漠视，对民主的漠视，对人权的漠视……”这是中国作家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一段话。余秋雨先生的话，道出了一个令国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如此漠视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为什么我们如此漠视生命、人性、道德、法律、科学、民主、人权？

的确，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讲述着一些触目惊心的事情：交通事故频发，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社会道德滑坡，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相悖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源头上入手，即从历史、传统、文化入手。

历史是民族的根，传统是民族的魂，文化是民族的命脉。只有深入了解和研究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才能真正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尊重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有文化底蕴、有道德修养、有社会责任感的民族。

当然，尊重历史、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相反，我们应该在尊重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勇于改革，勇于探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Chapter 1

第一章

旧有平衡

1

有时候老印度——那个许多印度人喜欢谈论的古老的、永恒的印度，似乎就这么延续着。上次大战的时候，一些英国大兵正接受化学战训练，他们驻扎在这个国家偏远的南方，靠近一座印度教千年古刹。寺庙里有一条宠物鳄，大兵们出于可理解的原因，射杀了那条鳄。他们还以某种形式（也许仅仅是他们的出现本身）亵渎了寺庙。不过大兵们很快就走了，英国人也统统离开了印度。现在距离那次亵渎事件已经三十多年了，在另一次紧急状态时期，寺庙得到翻修，一个新的神像被安置其中。

在被赋予生命和注入法力之前，这样的雕像不过是雕刻师院子里的摆设而已，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大小、材质以及工匠的手艺。印度教偶像来自于古老的世界；他们体现着深奥、有时是庄严的概念，而且必须以特定的规范塑造。印度教的偶像形象在今天不可能有发展，尽管受到印度电影和电影海报的影响，最近的一些形象没有古代原初形象那么概念化了，有种世俗的、玩偶式的漂亮。他们了无生气、姿态各异地伫立在雕刻师的展室中。偶尔会有一尊受命而塑的半身像，比如地方警察局的督察什么的，可能他空洞

洞的大理石眼睛上还会安一副真的镜框——这些花岗岩和大理石首先让人感到置身墓地，或是让人想起某个备受爱戴的死人。不过这样的展室是他们成神之前的过渡居所，每个雕像都等待着被买走、供奉，这样他们就有了生命和神性，每个雕像都白璧微瑕，为的是当神性生命降临的时候，不至于太令人恐惧。

所以在曾遭亵渎的庙宇里，神像必须被赋予生命，要举行特别的法事，所用的方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它把我们带回到宗教和人类奇迹刚刚开始的时候。这就是“言”的方法：泰初有言。一个十二字的符咒 (mantra)^①被吟颂并誊抄 5000 万次——这就是在这个宪法被冻结、新闻遭审查的“紧急状态”中，5000 名志愿者所做的事情。这件事完成后，新偶像下面要放上一块镌刻过的金牌，以证明神性之生成，以及志愿者之虔诚。千年古刹将重生：印度，印度教的印度，是永恒的：征服和亵渎不过是历史中的几个瞬间。

再往南大约 200 英里，巨大岩石的高原之上，是一度兴盛的印度维加雅那加 (Vijayanaga) 王国都城遗址。维加雅那加（“维加雅”意为胜利，“那加”意为城）建于 14 世纪，1565 年被一支穆斯林国家的联军占领，并被彻底毁坏。这个城市是当时

① Mantra：印度教或大乘佛教中的曼陀罗、祷文、符咒。

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城墙周长 24 英里，外国游客记录了其结构和精彩程度。毁城行动持续了 5 个月，有人说是一年。

今天，外城已经全成农野，零散可见一些砖石建筑的残迹。通加巴德拉河 (Tungabhadra River) 附近则有更为壮观的遗迹：一些宫殿和马厩、一个王家浴池、一座庙宇，里面有一组仍能奏乐的石柱、一道破损的渠、几根歪斜的花岗岩柱子，那一定曾是跨河的桥墩。河那边更多：一条长长的宽敞的道路，路的一端，湿婆神^①巨大的牛头塑像仍然半面临街，路的另一端是个奇迹：一座神庙出于某种原因在 400 年前的毁坏中幸存，仍然完好并香火不绝。

为此，朝圣者们来到这里献上供奉，用古老巫术进行祭祀。维加雅那加的一些遗址已被文物部宣布为国家纪念遗址，但对于人数远胜于旅游者的朝圣者来说，维加雅那加既不是它可怕的历史，也不是它一片荒凉的现在。可知的历史已经沦落为传奇故事：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一个天降黄金建立的王国，那王国如此富庶，珍珠和红宝石在市场上像谷子一样地贩卖。

维加雅那加对朝圣者而言就是那座幸存的古庙，周围的破败就像是古老魔力的证明，正如对过去辉煌的幻想调和着对现时破败的接受。曾经繁华的街道（它不是国家纪念遗址，仍然允许使用），现在是条陋巷。它未经铺设，表面上满是墨绿色的淤泥和

① 湿婆 (Shiva)，印度教主神之一，为毁灭之神。

粪便，趿拉着鞋的朝圣者毫不在意地踏过去，走向食品摊和纪念品店，那里收音机开着，震耳的喧闹。废墟上还有占地而居的饥饿的人和他们饥饿的牲口，残破的石墙以泥巴和碎石修补，几条门廊去掉了不久前还在那里的雕像。生活一天天过，往日在延续。经过征服与毁灭，过去的事物又再现着它们自身。

如果说，维加雅那加现在徒有一个名称，记得这样一个王国的人那么少（在 200 英里之外的班加罗尔^①，就有很多大学生连听都没听说过），那不仅因为它被如此彻底地夷为废墟，而且也因为它贡献很小；它本身就是过去的再现。王国由一个当地的印度教王公在 1336 年建立，他被穆斯林打败后押至德里，改宗伊斯兰教，然后又作为穆斯林政权的代表回到南方。在远离德里的南方，改宗的王公重建独立国，并且不合常规地打破印度教种姓规定，重新宣称他皈依印度教，是当地印度教神明在尘世的代言人。南方的大印度教王国就以这样的方式成立。

这个国家延续了 200 年时间，其间战火未歇。它从建国之始就以复兴已遭破坏的印度教为己任，从文化与艺术方面说，它保存并重复着印度教遗产，但很难有创新。其铜雕与 500 年前的没什么差别，其建筑即使是在当时，与周围的穆斯林建筑相比，也已显得沉重老旧。今天的废墟坐落于巨大岩石的冷漠风景之中，

① 班加罗尔 (Bangalore)，卡纳塔克邦 (Karnataka) 首府。

看上去比实际还要古老，像是一处早已被淘汰之文明的遗迹。

维加雅那加所宣扬的印度教已经走到尽头，而且已腐朽了，它就像风行的印度教那样，轻易地走向野蛮主义。维加雅那加有奴隶市场，有庙娼。它鼓励殉夫自焚（suttee）的所谓圣行，寡妇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以达至圣洁，确保夫家的荣耀并洗清这个家庭三世罪孽。维加雅那加还以人献祭。一次，在建造大水库时遇到了一些麻烦，维加雅那加大王克利须纳·德瓦·拉雅（Krishna Deva Raya）（1509—1529）命令用几个犯人祭祀。

到了 16 世纪，维加雅那加简直就是一个等待被征服的王国。但它宏大而壮美，需要管理者、艺术家、手艺人；在 200 年的历史里，它一定激发着土地上的全部才智，并集之于都城。王国被征服、其首都被有系统地摧毁时，遭灭顶之灾的就不仅仅是楼堂和庙宇了。生灵涂炭，王国中所有具备才智、力量、智识的人被世代消灭。征服者制造出一片荒漠，这几乎可说是自己求败于人：在接下来的 200 年中，死国之地被一遍遍地蹂躏。

今天，这里仍然显示着印度教的维加雅那加在 1565 年被损毁的结局：这个地区的“落后”众所周知，它看来似乎不存在历史，很难把它和过去的辉煌甚至大战相联系；在废墟不远处形成的霍斯派特城（Hospet）肮脏破败，用于农耕的乡野难有价值。

自独立以来，政府在这个地区投入了不少经费。通加巴德拉河

上建起了一道堤坝，还有一项合并了古王国时期灌溉渠的大型灌溉工程（仍然叫作维加雅那加渠）。一个维加雅那加钢厂正在筹建中；一个大学已经开始建设，用以训练本地人任职于钢厂及随之而来的附属工厂。重点是对这个地区的人、对当地人的训练。因为在这块曾经聚集了出色建设者的土地上，目前人力资源匮乏。本地区所属的邦是印度联邦中一个鼓励外来移民的邦，这儿需要技术人员、工匠；需要会简单技术的人，甚至需要饭店服务员。余下的只是那些不能理解“变化”观念的农民：就像生气勃勃的维加雅那加庙外面，那些在废墟上占地而居的人，他们在毁败的石墙间穿进穿出，像色彩斑斓的昆虫，在这个下雨的午后吵吵嚷嚷、没事瞎忙。

此次到维加雅那加，站在宽阔的庙前大道上（它看起来已不像 13 年前我初次造访时那么令人敬畏，也没了当年那种对神话般历史的直率言谈），我开始思考那上千年的侵略与征服注定要给印度带来的智识枯竭。发生在维加雅那加的事情，不同程度地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在北方，废墟压着废墟：穆斯林废墟下是印度教废墟，穆斯林废墟上还有穆斯林废墟。史书历数着战争、征伐和劫掠，却没有关注智识的枯竭，更没有留意这个国家的智识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个国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还是在遥远的过去完成的。印度人说，印度从征服者那里吸取经验，且比征服者存在得更久。但在维加雅那加，在朝圣者中间，我想知道，是否这 1000 年来在智识方面，印度不总是面对征服者而退

缩，是否在明显的复兴时期，印度不只是令自己重又变老，在智识上愈发狭小且永远脆弱。

在英国统治时代，这段悲惨的臣服时期同时也是印度智识再度辉煌的时期，印度的民族主义宣扬印度的历史；宗教与政治上的觉醒纠结混合。但独立的印度，其五年计划、工业化、民主实践，都让这个国家产生了变化。在民族以为骄傲的“老”与允诺带来的“新”之间总存在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令文明断裂开来。

这次印度的动荡不是起因于外国的侵略或征服，而是产生于内部。印度不能再以老方法应对，不能再缩回到古代。她所借鉴的机制已经产生了借鉴机制的作用；但古代的印度无法提供替代新闻、国会以及法院的东西。印度的危机不只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大的危机在于一个受伤的古老文明最终承认了它的缺陷，却又没有前进的智识途径。

2

“印度会继续。”这是印度小说家 R · K · 纳拉扬^① 1961 年

① 纳拉扬(R. K. Narayan, 1906—2001 年)，印度著名英语小说家，其小说的背景屡屡设定在虚构的印度南方小城马古迪 (Malgudi)，刻画普通百姓如何在印度教追逐永恒的传统信仰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夹缝中安身立命。重要作品包括《英文教师》、《宝典》、《糖果贩》等。

在伦敦对我说的话，那时候我还没去过印度。

小说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形式，并不属于印度的传统，它伴随着英国人来到印度，19世纪末期首先在孟加拉确立，然后传播开来。但直到英国统治末期的20世纪30年代，才第一次有严肃小说家在伦敦出版他们以英语写成的作品。纳拉扬是其中最早之一，也是最好的。他从没成为“政治”作家，甚至在风起云涌的30年代也不曾是，他也不像独立后的许多小说家那样，认为小说以及所有的文字作品都是用来为自己树碑立传和向世人夸耀的。

纳拉扬关注的始终是一个印度南方小镇上的人，他一本书接一本书地记述那里的生活。他在印度独立14年后的1961年说，不管尼赫鲁^①之后政治如何动荡，他确信印度会继续，这很像他在写于英国统治时期的最早一批小说里表达的确信，那时他说印度正在继续。在早期小说中，英国征服者如同生活中既定的现实，英国人自己走远了，他们的存在只隐藏在他们的机制中：银行、教会学校。作家深切思考着那些在底层继续的卑微生命：小人物，小伎俩，夸夸其谈，有限的意味：一个如此受约束的生命，却显示着完整和无损，这种渺小从未引发过思考，尽管印度

① 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 年)，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国大党主席。

本身常让人觉得广袤。

在 1974 年出版的自传《我的日子》(My Days) 里，纳拉扬为他的小说填充了背景。这本书尽管内容上比系列小说要扩大，但仍可被认为是其中一篇。它并没有在政治上进行探讨或给出结论。南方城市马德拉斯 (Madras) 是英国在印度最早的基地之一，这个据点由东印度公司在 1640 年向维加雅那加王国最后的遗民承租，纳拉扬在那里度过他大部分童年时光。马德拉斯所在的这个地区长期太平，与北方相比更印度教化，伊斯兰程度不高，有着 75 年的长时间和平。纳拉扬说，从克莱夫^①时代起，那里就不知道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巡游的德国战舰艾姆登号 (Emden) 在某夜现身海港，打开探照灯，开始炮轰城市，居民“对漫天星斗的天空突然雷电大作的现象感到惊奇”。一些人逃到内陆。纳拉扬说这一溃逃“跟早些时候的一次迁移行动步调一致，那次海上突卷暴风，有预言说世界将在本日毁灭”。

纳拉扬童年的世界是一个自得其乐的世界，它把自己变成一个预言和魔法的世界，远离重大时事，远离它能看到的政治可能性。但政治不请自到，而且以可能惟一的方式，偷偷摸摸地，混合着仪式与宗教而来。在学校的时候纳拉扬加入童子军。马德

① 克莱夫 (Robert Clive, 1725—1774 年)，英国将领、殖民主义者，1757 年率军占领孟加拉，为首任总督，1765—1767 年再任孟加拉总督并任驻印英军总司令。

拉斯的童子军运动由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①执掌，她是个神智学者，对印度文明有着比多数同时代的印度人更大的理想；为了迂回地颠覆巴登—鲍威尔爵士（Lord Baden – Powell）^②的帝国企图，贝赞特童子军以“主佑国王”的曲调唱道：“主佑我祖国，主佑我贵土，主佑我印度。”

1919 年的一天，纳拉扬参加了一个从“伊湿伐罗”（Iswara）^③古庙出发的宗教游行。队伍唱着“爱国歌曲”，高喊口号，然后返回古庙，有人在那里分发甜点。这项喜庆而虔诚的活动是马德拉斯的第一次民族主义骚动。纳拉扬没有提及，那其实是甘地领导的全印度抗议活动的一部分，甘地那年 49 岁，从南非回国 3 年，在印度还不怎么知名。纳拉扬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游行，但他的一个年轻而时髦的叔叔（印度最早的业余摄影家之一）却并不那么高兴。纳拉扬说，这位叔叔“反对政治，不想我误入歧途。他把所有的统治者、政府和行政机关全都骂成是魔鬼，认为寻求统治者的更迭是毫无逻辑的”。

好吧，这就是我们的起点，所有 40 岁以上曾居住在殖民地的

① 贝赞特夫人（1847—1933 年），英国社会改革家，费边社会主义者，神智学者，主张节制生育，曾在印度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并且参与印度独立运动。

② 巴登—鲍威尔（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 – Powell，1857—1941 年），英国陆军军官，童子军创建人，并同其妹 Agnes 创建女童子军。

③ Iswara，意译“自在天”，印度教名词，指有位格、有限的神。不同于作为绝对的、超然的、最高实在的梵天。是神的人格化。因此同一位神在不同教派中可成为不同的伊湿伐罗。

人，学会与臣服观念共生的臣民。 我们生活在自己无关紧要的世界中；我们甚至可以假装这个世界是完整的，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它曾经被打碎。 动荡、不安和发展都在别处；我们这些战败的、远离时事的人生活在和平之中。 我们在生活中成了参观游览的对象，一如在文学中一样。 溃败而臣服，这使不同的地方变得相似。 纳拉扬的印度及其殖民地机制，很像我童年的特里尼达。 他对于这个机制的婉转看法也和我的一样；从他小说所表现的印度人生活中，我发现了来自世界另一头那个印度人社区生活的回声。

但纳拉扬的小说没有让我意识到印度的苦痛。 作为作家，他获得了太大的成功。 他的喜剧需要置于严格的、条律分明的社会场景中；他刻画直接、笔调轻触，尽管用英语来讲述印度风情，却很成功地将异域风情写得平易普通。 我知道他虚构出来的小镇是艺术的一种创造，所以是在一定程度上人为的、简化的现实。 不过真的现实是残酷而迫近的。 书里的印度似乎触手可及，现实的印度则始终隐而未现。 要深入纳拉扬的世界，要获得他从印度的缺陷与渺小中所发现的秩序与连贯，要了解他的讽刺性认同并品味他的喜剧，就得无视太多可被看到的事实，去除太多的自我：我的历史感，甚至是最简单的人类可能性的概念。 我并没有失去对纳拉扬的敬意；但我觉得他的喜剧和讽刺并不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是印度对世界回应的一部分，我对这样的回应已不能认同。 于是有件事对我渐渐清楚了，特别是在这次游历

中，慢慢重读着纳拉扬 1949 年的小说《桑帕斯先生》(*Mr. Sam-path*)的时候——那就是，由于书里所有的人格怪异的快乐，纳拉扬的小说不再成为我一度以为的纯粹社会性喜剧，更倾向于宗教书籍，时常还是宗教寓言，而且印度教色彩浓烈。

斯里尼瓦斯 (Srinivas) 是《桑帕斯先生》的主人公，他是个喜欢沉思的闲人。他做过很多工作——农业、银行、教育、法律：印度独立前的那些工作，时间是 1938 年——最后全都辞了。他呆在家宅中（印度大家庭的宅子）自己的屋子里，担忧时光之逝。斯里尼瓦斯当律师的哥哥照料着宅子，这意味着他照料着斯里尼瓦斯和他的妻儿。斯里尼瓦斯有家，这一事实与他的年龄一样令人吃惊：他 37 岁了。

一天，斯里尼瓦斯正在屋里读《奥义书》(*Upanishads*)^①，他哥哥走进来说：“你这辈子究竟想做什么呢？”斯里尼瓦斯回答：“你没看到吗？人生有十项奥义，我要完成它们，现在是第三项。”但斯里尼瓦斯还是接受了暗示，他决定去马古迪镇创办一份周报。他在马古迪拥挤的街巷里租到一间陋室，洗澡只能用公共水龙头，又找了一个阁楼当报社的办公室。

斯里尼瓦斯现在入世了，他有了新的责任和新的人际关系：他的房东、他的印刷商、他的妻子（“他自己都奇怪，在这些年的婚

^① 奥义书：印度教古代吠陀教义的思辨作品，后为后世各派印度哲学所依据。

烟生活中他几乎没注意过她。”），但是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无为之完美。“当他对市政或社会的缺点大加挞伐之时，一个声音一直在问：‘生命、世界和所有这一切都在走向消逝，为什么要烦恼呢？完美与不完美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真的烦忧呢？’”

他的这些沉思看似无聊，而且有种半喜剧性的效果；但却把他推向了更深层的清寂无为（quietism）^①。一天他在小屋子中听到街巷上一个妇女卖菜的吆喝声，他先是好奇于她和她的主顾，然后则好奇于每天相遇或冲突的“人的巨大力量”，斯里尼瓦斯感应到“生命全景之浩瀚与广袤”的启示，于是头晕目眩。他想，神就是在这“全景”中被感知的；后来，他还在这样的全景中达到一种美妙的平衡。“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人性有种全面的理解，那么他也能正确地理解世界：事物没有特别的对与错，它们只是在平衡着自身。”已经没有必要干涉、没必要去做任何事了。在有一天和妻子拌嘴之后，斯里尼瓦斯更是轻易便充分理解了甘地的非暴力。“所有形式的非暴力，无论大或小、个人或国家，都注定在个人和社会两方面产生一种没有焦躁、没有纷扰的安宁。”

但这样的“非暴力”或“无为”要依靠社会的继续，依靠其他人的“为”。斯里尼瓦斯的印刷商关了门，斯里尼瓦斯的报纸

① Quietism一词还指天主教神修学派中主张寂静修德、逃避外务的“寂静主义”，在此为突出宗教区别，取“清寂无为”之译。